

以“两个结合”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 徐世昊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两个结合”为理论指导，统筹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建成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蕴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的物质成果，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整体文明程度，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繁荣与进步。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深刻阐明了物质文明进步对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精神文明的发展可以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由之路。

二、“两个结合”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打开了理论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首先，“两个结合”为“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我们能够从现实国情出发，科学把

握物质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我们能够在文化层面建立起深厚的价值共识与道德根基。“两个结合”既是理论创新的成果，更是实践发展的指南，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支撑和方向引领。其次，“两个结合”为“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夯实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坚持“两个结合”使中国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人民需求，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独具中国智慧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不仅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还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相契合，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灵感之源。持续深化“两个结合”，能够有效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最后，“两个结合”为“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厚植了文化土壤。在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的过程中，文化既是价值引领的核心，也是社会认同的基础。通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更在实践中打通了古今之间、民族之间、制度之间的文化隔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中道之治”“天下为公”等理念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明形态。“两个结合”厚植的文化土壤为精神文明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历史张力与文化穿透力。

三、“两个结合”推动“两个文明”的实践路径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非两条平行轨道，而是互相支撑、动态互动的统一体。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既要

有科学的理论引领，也要有深厚的文化滋养。“两个结合”提供了这一发展战略的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并重并举，是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不断跃升的关键路径。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筑牢物质文明发展的科学根基。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了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物质文明建设注入了鲜明的人民性导向。再次，马克思主义注重制度建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才能确保我们在推进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方向不偏、动力充足、成果共享，为“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筑牢坚不可摧的科学根基。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厚植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底蕴。精神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思想体系的引领，更需要深厚文化资源的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层文化土壤。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持久生命力和现实感召力，才能为精神文明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大的文化养分，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拥有坚实的物质支撑，更拥有深沉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动力，真正实现文明形态的整体跃升。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钥匙。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需求，必须把“两个结合”贯彻到国家发展全过程、社会生活各方面，使之成为引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旗帜与实践引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物质富强与精神富有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明基础。（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文明互鉴历史语境中不断探寻文化保真的可能途径

——以杜甫诗歌翻译为例

◎ 任晏言 党争胜

英国BBC制作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一次以纪录片的方式，向西方国家介绍了这位中国“诗圣”“诗史”。然而杜甫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却名实不符，这与杜甫诗歌的翻译问题密切相关。普遍认为诗歌翻译者的最佳人选是精通诗歌艺术的诗人，他们比学者型译者更重视诗歌的审美特质，更能使译作富有诗意，但杜甫却在富有诗意的译诗中遭受变形重塑，失去了个性特征，这与诗人译者们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息息相关。

杜甫诗歌的文化价值

杜甫诗歌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切入点。杜甫生活的唐朝从强盛走向衰落，他目睹了战乱、动荡和百姓的苦难，把这些都写进了诗里。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了其对贫富悬殊的愤怒控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则展现了他渴望庇护天下读书人的仁爱之心。在当前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杜甫诗歌探讨的苦难、正义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它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通过他的诗触摸到中国传统中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伦理情感，成为了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深刻对话时的精神桥梁。此外，杜甫诗歌本身所达到的语言艺术和审美高度也让它成为翻译中“如何保持原汁原味”这个难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杜甫被尊为“诗圣”，不仅因为他思想深刻，更因为他在写诗技巧上的炉火纯青。他的语言精炼传神，他选用的意象，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花鸟既来自日常所见，又饱含着深沉的情感。当要把这样的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准确传达意思，同时又保留原诗语言的精妙、音韵的节奏以及丰富的意象，每一次翻译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保真”的路径。由此，研究杜甫诗歌的翻译意义深远。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让一种文化中最顶尖的艺术表达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异域文化中真实展现其光彩成为了重要课题。

英语诗人的翻译动机

诗人译者身份的双重性使得他们的翻

译动机不同于学者型译者，后者更多关注诗歌翻译的忠实程度，翻译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学术型的翻译往往因学术究气过重而影响诗意的传递。诗人译者则不同，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意在创作的诗人，其翻译目的并不在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是在翻译中寻求创作的灵感，利用杜甫诗歌的异质性特征激发出他们更多审美表达的可能性，因为翻译向来都具有文化建构的功能，在引进异域诗风、革新传统诗学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美诗坛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反传统诗歌运动，诗人们发现传统的英语诗学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表达现代生活的愿望，诗人们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东方文学中潜藏的自然人性的力量，他们开始以翻译汉语古诗的方式来寻找新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形式，杜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英语诗人的视野，杜甫诗歌意义和形式的复杂多样为英语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杜甫诗歌中对社会、对自然、对家庭、对朋友那种深沉的感情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并且这些感情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人与世界合二为一的审美结构完全不同于主流英语诗学追求的主观主义和抽象主义，对英语诗人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英语诗人翻译杜甫诗歌的动机主要是以译促创，以自身的创作需求和诗学取向为标尺，对杜甫诗歌进行有意识的裁剪，探索和学习其中的技艺并为自己所用，并以他者的眼光反照自身，重新评估他们对英语诗歌的观念，这种按需求索的翻译动机导致杜甫在不同的翻译者笔下形成了不同的形象。

英语诗人的翻译策略

从整体上来看，诗人译者普遍以纯文学的方式看待杜甫诗歌，将其视为文学形式宝库，他们的翻译策略大致可概括为内容的归化和形式的异化，前者指的是诗人译者结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异域憧憬想象，对诗歌内容进行本土化改造，后者指的是诗人译者根据诗歌创作的陌生化理念，对诗歌意象和语言特征的刻意保留。由于现代主义诗人们在理论上阐释了自由诗的

价值，他们在翻译杜甫诗歌时也放弃了对格律的追求，去掉格律的诗歌重心落在了意象上，因此诗人们聚焦于杜甫诗歌意象的选择和组合，而中西诗学对意象的理解又有出入，前者强调主观感情和客观物象的交融，认为意象必须经过诗人的选择加工并注入诗人个性化的感情，后者则主张将感情隐藏于具体的客观物象之后，因此诗人译者在翻译杜甫诗歌时往往求“象”舍“意”，利用名词短语并置的方式突出意象的对立效果，同时通过减少逻辑关联词的方式降低诗句的语法性，放弃严格的词性对应，仅保留意象的视觉对比，这种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诗歌意象和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意象营造出的诗意境界，但杜甫倾注在意象中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儒家意识形态往往就此失落在翻译中。此外，英语诗人对杜甫诗歌的翻译大多采取了去历史化的策略，以浪漫抒情代替冷峻史笔，以普遍性的诗学共鸣来置换杜甫诗歌中沉重的历史感，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对杜甫诗歌中的典故进行改写或者删除，然而典故恰好是杜甫诗歌彰显历史联系的重要手段，黄庭坚甚至用“无一字无来处”来形容杜甫与文学传统的深度互文。因此英语诗人去历史化的翻译策略固然可以增强译诗的可读性，将杜甫重塑为世界性诗人，加快杜甫诗歌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但这样经过诗人译者变形重塑的杜甫缺乏支撑“诗圣”“诗史”之说的核心，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说法也因此失去了说服力。

综上所述，杜甫诗歌独有的诗学品质吸引了一代代英语诗人对其进行翻译，然而这种品质却恰恰失落于他们的译笔之中，这是因为诗人译者以翻译杜甫诗歌为方法，旨在通过翻译杜甫诗歌的过程解决自身的思想和诗学困境，探寻自身诗歌语言与精神突破的可能与重生，而不是以翻译杜甫诗歌为目的向英语读者呈现真实的杜甫。在如今文明互鉴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应该深度反思这种经由翻译而产生的过滤和变形，不断探寻文化保真的可能途径。

（作者任晏言系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作者党争胜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践行教育家精神：熔铸教育伦理 涵育文明共识

◎ 范萃妹

在培育时代新人、引领文明风尚的过程中，高校教师肩负独特使命。现代教育的核心任务是把教育价值追求和实际操作相融合，从而促使高校教师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贯通教育伦理与社会文明共识架设了价值桥梁。

一、教育家精神在教育伦理中的价值升华

教育家精神核心内涵以及价值提升的逻辑基础，给高校教师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深刻理论指导与明确实践方向。在推动教育伦理升华的具体过程中，高校教师起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用，肩负的职责不只是单纯传授知识，更在于引领整个社会的文明风尚走向，为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教育伦理的核心要点是思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三个重大问题，高校教师要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作为指导方向，把个人的学术追求和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师生关系伦理的构建至关重要，高校教师要按照言传身教的标准，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程紧密结合起来，展现出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行。

二、教育家精神与文明共识的逻辑构建

教育家精神的文明共识形成逻辑在于，教师应当将抽象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行为，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实现从教育伦理到文明共识的跃迁。教师需要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精神，深入探索学生特点与社会发展需求，设计启发性教学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以乐教爱生的情怀，关注学生成长，引导学生在职业道路上践行工匠精神。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教师实现教育家精神途径主要靠建立多层次、立体化实践体系。建设“双师型”教师团队是产教融合的首要任务，这也成为推动高校教育发展的核心措施。高校应当完善教师挂职企业相关制度，鼓励教师走进企业参与生产和研发过程，教师通过参与企业工作积累行业实战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转化为教学内容，把实际项目案例带入课堂，增强教学实践性与创新性。在职业教育领域当中，教育家精神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老师们不仅传授理论知识，还要带领学生深入企业一线进行实践，让学生在实操中理解严谨细致、追求卓越的职业素养。

青年话语转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高校实践

◎ 郑庆安

在当代中国青年的认知模式由文本化、接受式的传统形态，转向视觉化、交互式的新媒体形态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代际话语隔阂、传统教育式微与青年主体性觉醒三重挑战。武汉轻工大学以青年话语转换为突破路径，通过重构主客体关系，推动青年从教育对象升维为传播主体，构建起故事化、场景化、交互化三位一体的传播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嵌入青年原生活语体系的创新实践，为破解高校打通思政教育“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可复制的样本。

认知变革：青年话语的范式重构

回应时代挑战需要深刻理解青年认知的结构性特征：当代青年的信息接收呈现视觉化、碎片化与交互性特质，对单向灌输存在本质性疏离。新媒体生态的深度演化使沉浸体验与即时反馈成为常态，深层动因在于青年主体意识的历史性觉醒——他们渴求通过创造性参与实现价值确证。青年话语转换正是对这一命题的主动回应，其本质是推动传播主体身份革新与符号系统适配的双重变革：既让青年从“教育受体”转变为内容生产者，又运用其熟悉的视觉叙事、圈层语言和互动媒介承载理论内核，最终实现话语场域的权力结构重塑。

三维实践：传播模式的体系创新

武汉轻工大学的创新实践聚焦于构建三维传播模式。在故事化转译维度，深耕本土叙事资源破解理论抽象性。学生在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聆听林祥谦烈士“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的誓言时，“工人阶级先进性”转化为直击心灵的生动注脚；站立武钢一号高炉前，追溯毛泽东见证铁水奔涌的历史场景，建设者奋斗故事与“自力更生”精神形成可触可感的互文。在场景化传播维度，课堂边界被社会化认知情境打破。武钢智慧管控大厅的实时数据流演绎生产力发展的当代叙事，英山县“村干部的一天”角色体验解码基层治理逻辑，专业场馆中学生获奖模型成为“工匠精神”的物化表达。在交互化表达维度，传播权力结构被彻底重塑。“研究生讲思政课”竞赛实现教学主体翻转，“微光”志愿服务活动中，大学生与留守儿童共建“梦想之光”完成代际价值传递，知识竞答等设计解构单向灌输模式，使青年在参与中激活主体自觉。

三、教育家精神在教学中的实践向度

随着教育技术伦理持续不断地推进，高校教师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深入应用，要求教师在掌握先进技术时处理好技术和人文的关系。如教师利用直播平台展现乡村真实面貌、助力农民推广农业产品，同时坚持传递教育的本质价值，学生在学习直播技能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相关操作技巧，还深入了解乡村发展实际。高校教师搭建“数字人文”教学平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创新探索，如某高校历史学院借助VR技术再现古丝绸之路，给学生带来沉浸式学习体验；引导学生关注技术伦理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使用技术的观念。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不但要传授专业方面的知识，还应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文学课程要深入分析作品里的家国情怀，理工科课程则需强调科技进步对国家实力的促进作用，以此来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就像有些高校教师投身于航天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他们依靠自身的专业水平与爱国情怀，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和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结合起来，为国家航天事业培养既有专业素养又有爱国情怀的优秀人才。

高校教师依据学科特色以及社会需求去策划跨学科项目，通过采用项目制学习方式为教育注入全新动力。一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推出红色文化沉浸式课程，教师带领学生开展实地调研红色文化遗址活动，设计线上展览等项目，让学生在实操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还有一些高校思政教师团队推出“行走的思政课”项目，教师带领学生走进社区以及贫困地区开展活动，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和扶贫调研实践中深入理解认同思政理论，学生由此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项目制学习方式促进教育从理论学习转向实际行动。

四、结语

从教育伦理到文明共识，高校教师职业价值围绕“立德树人”持续升华，在教育家精神指引下教师坚守职业伦理底线，肩负起传承文明使命，用专业知识和高尚品格描绘新时代文明画卷，培养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为社会文明前行注入动力。

（作者单位：广西职业学院师范学院）

实效验证：知行转化的证据链环

实践成效在认知、情感、行为的转化链中获得实证。认知深化体现为理论的内生性理解——当学生立于武钢高炉旁触摸斑驳炉体，钢铁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关联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原理在具身体验中完成意义重构。情感认同通过情境化动员深度激发：当学生重走长征路时，浸透衣衫的汗水将“艰苦奋斗”转化为肌体记忆；《少年中国说》手舞舞中，童声演绎的爱国情怀使理论升华为情感共振。行为转化彰显知行合一的价值外显：砺产业学院“砺旅融合”助农方案实现知识向生产力的创造性转化，土建学院十年乡村服务为儿童植入“科技报国”信念，实证“认知—认同—践行”的育人闭环形成。

深化路径：效能提升的三维探索

面向未来发展，学校在三维维度深化探索。理论根基层面，通过专家督导与精读工作坊强化学理纵深，在历史比较中阐释“钢铁强国”命题当代价值，设置社会思潮辨析模块培育青年理论批判力。技术赋能维度，开发“高炉记忆”沉浸剧场等数字产品，建立需求画像数据库实现精准触达，推动教育场景向短视频、动态漫画等多媒介转化，同步设置人工干预机制突破“信息茧房”。长效机制领域，实施“青苗计划”构建人才梯队，在武钢等基地建立制度化教学点，打造“行走的思政课—轻马宣讲团—微光志愿队”三维联动矩阵，通过省级思政精品项目培育可推广范式。

有机融合：理论生命的青春对话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深植于青年主体的创造性转化。当高炉前的讲述赋予钢铁精神当代形态，当“梦想之桥”贯通代际理想，当先烈誓言在青年口中重获新生，理论便在与实践的对话中持续焕发感召力。其本质在于确立青年在传播生态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其表达范式，激发其创造动能，实现其价值确证。这不仅是提升思政教育实效的关键进阶，更是马克思主义在时代浪潮中永葆生机、于青年心田深植信仰的必然选择。唯有推动青年实现从“受体”向“主体-载体-本体”的持续跃迁，方能为培育民族复兴栋梁筑牢历久弥新的思想根基。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